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一辑）



晚清国家与社会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一辑)

晚清国家与社会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8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晚清史学科晚清史论丛 第一辑)

ISBN 978 - 7 - 80230 - 743 - 8

I. 晚... II. ①中... ②苏... III. 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 清后期 - 文集 IV.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1411 号

前 言

1840~1911年的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之大变局时代。它既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王朝走向崩溃的时代，也是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就学科地位而言，晚清史不仅是断代的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其独特的地位，晚清史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重视，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于晚清史研究，曾会聚范文澜、刘大年、罗尔纲等一批著名学者，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论著，迄今享有盛誉。在2003年的学科调整中，晚清史学科仍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以保持其学科优势。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一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也以晚清史研究见长。回顾总结晚清史研究状况，我们认为晚清国家与社会问题是目前深化晚清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国家—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在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引入“国家—社会”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的一种反动。在后两种研究模式之下，某些美国学者往往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视为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认为“传统中国”为“停滞不前”的社会，只有在代表“现代”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跻身现代文明国家。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以来，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包括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因不满“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所显露的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尝试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探究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进而发现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各种张力，并以此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切入点。如华裔学者张仲礼、瞿同祖、何炳棣和萧公权等有关明清以来中国乡绅社会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视了绅士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的地位、角色及影响。美

国学者孔飞力 (Philip A. Kuhn)、白蒂 (Hilary J. Beattie)、兰金 (Mary Rankin)、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等人关于晚清以来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对于传统社会解体的影响的探讨, 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乡绅社会的研究。目前,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或者“第三领域”的讨论, 实际上都是“国家—社会”这一研究理路的继续和发展; 当然, 其中也受到西方一些新的理论和思潮的影响。

在美国中国学的影响下, 同时伴随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勃兴, 有关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亦成为目前国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自 1980 年代以来, 国内史学界不但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清士绅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论著, 而且对中国近代商会、义赈、农村社会发展状况, 以及城市茶馆、公园、报馆的现代性诸问题, 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 或多或少都与“国家—社会”的问题意识有关, 有些则是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直接回应。

“国家—社会”研究模式在推动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所起的作用, 有目共睹。但检视国内外学界在该研究模式之下所做的相关研究, 亦暴露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其一, “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作为对“挑战—回应”、“传统—现代”研究模式的一种反动, 其在研究中往往受模式的限制和束缚, 过于突出和强调中国中心观, 不同程度地忽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动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的事实; 其二, 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 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完全对立起来, 作为对国内以往“革命史”研究模式的一种否定, 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界定在社会史研究领域, 将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的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 其三, 作为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演变, 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出现趋于琐碎的流弊; 其四, 在有关晚清和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话题, 有悖“国家—社会”研究模式初衷, 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

我们认为, 有关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 应尽量避免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主义。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演变, 其动力既来自中国内部, 同时也来自外部的冲击, 这是晚清以来的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而从学科的划分来说, 有关晚清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研究, 应当既是政治史研究的内容, 又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研究晚清以来国

家权力的演变，须研究晚清以来的国家制度、政策，研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研究一些重要的政治势力和派别，等等。这些显然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即使一些看似纯粹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诸如仪式、习俗、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同样也离不开政治史的研究。这些社会问题，毕竟或多或少受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或制约。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温床，反之国家又是控制社会的机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必然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

我们还认为，晚清国家与社会，既是研究的范围，也含有方法论的意义。对象和方法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没有政治史的框架，没有宏观的对于整体的全局的把握，晚清史的研究就会失去方向；但没有社会史的考察，许多具体问题，甚至一些重大问题，则难以解决。国内晚清史研究既要积极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同时亦不能人云亦云，为国外的研究模式所囿；尤其是晚清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并有所超越，有所创新，走我们自己的研究道路。

此次由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和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共同发起，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等7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旨在促进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突破“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论”范式的束缚。会议于2006年8月25~27日在苏州大学本部红楼举行，共有来自海内外33家学术单位的75位专家学者出席，提交论文62篇。在这些论文中，有些偏重考察晚清政局的变动，如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张之洞之死与舆论反应，光绪、慈禧之死考辨，晚清满汉关系，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地方督抚与清廷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有些则偏重研究晚清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如关于清末督抚衙门改幕为职问题，光绪前期户部在清理积亏、整顿财政问题，晚清漕运官制变革问题，“政府”含义考辨，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问题等；有些偏重考察晚清社会问题，诸如晚清灾荒和义赈及慈善组织问题，晚清社团组织和公共空间问题，晚清地方士绅和宗族及秘密会社问题，晚清思潮和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之互动等；有些偏重晚清经济问题，关于洋

务运动时期中外贸易状况的变化，晚清商办铁路中的官商关系，晚清同光年间松江土地买卖交易形式的变化等。此外，也有学者专文探讨有关西方国家对晚清政局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反应。尽管这些文章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讨论中与会学者都没有将晚清国家的研究与晚清社会的研究对立起来，相反，主张在研究晚清国家问题时应不乏社会史的关注，而在研究晚清社会问题时则不乏政治史的眼光，很好地践行了本次会议的旨趣，实现了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对话，实现了“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论”两种截然对立的思维定式的对话与融合。为此，我们对共同参与主办会议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表示由衷的谢忱。没有这些单位的鼎力相助，这次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对拨冗与会的专家学者同样表示由衷的谢忱。没有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次会议不可能开得如此精彩，也不会有现在的这本论文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由于已在其他刊物全文发表，如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的《从满清王朝到中华国家——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与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载《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1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的《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对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再讨论》（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未再收入本论文集，此为一点遗憾。

此次“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承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先生、宋月华女士为本书贡献颇多，提供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本论文集的出版，只是我们为推动晚清史研究所做的一次尝试。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就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海内外学界同仁相互切磋，出版相关专题研究论文集。衷心期待学界同仁继续支持我们的事业，共同促进晚清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政治史研究室（晚清史学科）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07年3月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 / 1

晚 清 社 会

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 姜 涛 / 3

关于上海外滩公园的历史记忆 熊月之 / 14

晚清政府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治理

——以末后一着教案为例 韩志远 / 34

太平天国时期国家、地方与会党的关系

——以天地会起义为例 邵 雍 / 55

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 华 强 蔡宏俊 / 64

太平天国奠都之初的妇女问题 侯竹青 / 76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及其

影响散论 高鹏程 池子华 / 93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

——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朱 浒 / 103

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上海公墓变迁 陈蕴茜 吴 敏 / 122

晚清大众传媒的社会导向

——以《点石斋画报》中“祥异事件”为对象的分析 朱晓田 / 137

晚清国家与社会

- 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 …… 徐茂明 / 154
- 清同光年间江宁府城隍庙告示碑考释
——兼论城隍庙的教化功能 …… 张 蕾 / 168
- 官、民、洋三元互动格局中的商会与中美工约
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 …… 许冠亭 王国平 / 186
- 清末新式学务团体和教育界的形成：以江苏省为中心 …… 赵利栋 / 205

晚 清 政 局

再谈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 为金田起义 155 周年而作 …… 方之光 / 225
- 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 桑 兵 / 240
- 时人日记中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死 …… 马忠文 / 257
- 从三份历史文件看庚子之战的性质与起因 …… 朱东安 / 269
- 晚清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 王开玺 / 290
- 立宪派、地方督抚与清廷之间的互动关系
——围绕国会请愿与责任内阁制问题的探讨 …… 李细珠 / 307
- 立宪运动及立宪派与民初议会制的建立 …… 季 鹏 / 324
- 北洋集团对清室军权的侵夺及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 马平安 / 333
- 刘丽川上太平天国天王奏折考 …… 张铁宝 吴 瞻 / 349
- 吴棠在清淮 …… 顾建娣 / 368
- 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再考察 …… 崔志海 / 380

晚 清 制 度

- 历代“政府”考 …… 王宏斌 / 401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论纲	何 瑜 张 波 / 415
清末督抚衙门的改幕为职	关晓红 / 433
晚清预备立宪与司法“独立”	迟云飞 / 443
试论晚清漕运官制变革	倪玉平 / 457
“常”与“变”：光绪前期清理州县积亏及制度因革	刘增合 / 466
晚清外国传教士的中国法律观	杨大春 / 482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眼中的《大清律例》	侯 毅 / 496

晚 清 经 济

洋务运动时期中外贸易状况变化的几个问题	虞和平 / 513
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的改制	卢伯炜 / 529
张之洞与沪宁铁路	朱从兵 / 546
对抗与妥协间的游移	
——探析晚清铁路商办历程中的官商关系	马陵合 / 566
甲午战争之前官方对待民办实业态度的再认识	李 玉 / 583
晚清同光年间松江的土地买卖交易形式变化	
——上海市档案馆藏松江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邢丙彦 / 600

晚 清 思 想 文 化

南洋归来知识分子与晚清国家和社会	
——以辜鸿铭、李登辉和伍连德为例	黄贤强 / 617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	郑大华 / 631
道光朝经世实学的复兴与黄河文化的流变	李 峰 / 653

近代中国启蒙者的悲剧

——以湖南时务学堂为中心的探讨 马 勇 / 663

晚清史学的发展与变革 刘俐娜 / 680

论张穆《蒙古游牧记》的史学价值 侯德仁 / 699

有限自由 服从法律

——清末两位有识之士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之认识 俞 政 / 714

王韬、容闳的个人经历与近代西学东渐中

知识分子的境遇 袁 蓉 / 730

晚清社会

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

姜 涛

一 近代以来三次大的人口损失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灾荒所造成的饥馑以及瘟疫等天灾人祸的影响，中国共有 3 次大的、死亡人口各超过千万的人口损失。由近及远向前追溯，依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3 年困难时期（1959 ~ 1961）、8 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 ~ 1945）以及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0 ~ 1878）。

二 太平天国战争：“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

太平天国战争，按照美籍学者何炳棣的说法，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①。关于这场战争，有着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叛乱、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等等不同的提法，各有其依据，也都能自圆其说。这里不一一去做辨析。但从人口史的角度，从人口研究的角度，提“太平天国战争”似乎更贴切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将其下限一直向后延伸至 1878 年，也即全国性战乱的最后止息^②。

①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p. 274.

② 按：道光三十年十月，也即 1850 年 11 月，洪秀全等准备金田起义，这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开始。光绪三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也即 1878 年初，清军左宗棠部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标志着全国性战乱的最后止息。

在此期末发生于中国北方的“丁戊奇灾”（1877~1878，实际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即1876~1879）也应在我们的考察视野之内。尽管从表面上看，它并不是战争行为的直接结果，但其发生时全国性战乱尚未最后止息，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割断它与这场战争的种种关联。

三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 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中国近代以来3次大的人口损失，以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历时最长，人口损失的比重，也即相对人口损失为最大。但相关的研究却最少，取得的所谓成果也最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迄今只有很不确切的各种估计和估算，还不能说是有了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①

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人口统计资料的匮乏。

中国之近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始于清末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1910~1911）。在此之前，始于乾隆年间的有关大小男妇的“民数”统计，也可以视作较为近实的人口统计。但这种民数的统计，在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渐偏离实际。而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所谓的民数统计已完全成了虚应故事。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至清末的几十年间，除个别地区、个别时点外，没有确切可靠的人口统计资料，尤其是缺乏省级以上的全局性的人口统计资料。现存的各种文字性记载（政府档案史料、各地方志、清人笔记等等）亦很难据以转为量化的考察。

其次，那场战争毕竟离我们已过于久远。

中国近代以来战争动乱频仍，晚清时期自不必说，即使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近代科学研究业已引入之时，人们也无法从容对太平天国战争及其人口损失进行研究。还在抗日战争进行之时，毛泽东即提议：“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②

^① 关于现有研究成果的论述，可参见华强、蔡宏俊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

^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第801、802页。

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于太平天国战争史的研究。而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应是其重要课题之一。然而当时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甚至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问题的调查统计，虽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却又因内战的爆发而不得不中止。

现在从主观上说，有条件着手进行这样的研究了，但客观上难度也更大了。比如，除保留至今的文字资料外，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从民间搜集到与那场战争相关的较为可靠的口碑资料，也很难利用现有的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向前回溯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

四 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之一： 是否过剩人口引发了战争？

但“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这一专题的研究还是有必要进行下去。其要点有二：第一，是否战前的人口过剩引发了战争（革命、战乱）？第二，太平天国战争本身对晚清人口的影响究竟如何，或简而言之，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大损失？

先讨论其一。

早在太平天国战前 50 多年的 1793 年，乾隆帝以及被后人誉为“中国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曾明确表达了对人口不断增长的忧虑。^①

后来，当太平天国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之时，汪士铎更进一步提出“人多”引发“世乱”的命题。^②

① 乾隆五十八年（1793），已届耄耋之年的皇帝在一份上谕中指出：“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来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见《清高宗实录》第 1441 卷，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同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1746～1809）写下了《治平篇》与《生计篇》。这位被后人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桂冠的学者，在文章中充分阐述并进一步发挥了乾隆皇帝的有关思想，明确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见《洪北江诗文集·意言》。

② 参见《汪梅翁乙丙日记》第 3 卷，明斋丛刻，1936，第 28 页下。

此后，不断有人重复类似的论点，但直到1949年初，罗尔纲在题为《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的长篇论文中，才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加以研究论证。罗文不仅考察了太平天国革命前一百多年间清代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而且分析了这一时期人口与耕地比例关系的发展演变，并较为广泛地搜集了统计数字之外的有关人口压迫的种种事实，如人多米贵，国内移民，向边疆、海岛、海外的非法迁移偷渡，垦山，以及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的各种过剩人口，等等。在比照了当时的人口论，即洪亮吉和汪士铎的有关言论后，罗尔纲得出结论说：人口过剩确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①

在罗尔纲之后，何炳棣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扩至明代初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六百年间。他致力于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做一种历史的、背景的解释，除对人口本身的考察外，他还着重探讨了明清以来的土地制度及其利用状况。何炳棣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是历史的、考辨的，观点却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他提出了中国本部的稻米栽培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已达到其饱和点的著名论断，从而支持了罗尔纲关于人口过剩是太平天国革命主因的见解。^②

然而他们的论证以及后来一些学者企图利用“人均耕地指标”证明太平天国战前存在所谓“绝对过剩人口”的努力，都无法从所谓“过剩人口”推导出太平天国革命必然爆发的结论。早在1956年王亚南在批评罗尔纲用中国人口数字和土地亩数及其比例论证人口压迫问题的做法时即指出：“他好像一点也没有感到，从这样一个比例中，怎么也不能结论出太平天国的运动是一种大革命运动。”^③一位热心倡导人口增长经济学的美国学者在评论何炳棣关于人口压力是太平天国革命最基本原因的结论时也认为：“对于这样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判断，很难加以支持或反驳。”^④就是说，既难证是，也难证非。

“人口引发革命”这一貌似简单的难题，完全可以比作社会科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充分表明在研究人类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时的索解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1月。

② 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pp. 183、274.

③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1月；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科学出版社，1956。

④ [美]朱利安·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47页。